

发展与发展干预过程中的乡村代理人

——基于宁夏回族社区设施农业发展项目的个案研究

郑 鹏, 李婵娟, 左 停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 北京 100193)

摘 要 通过对一个“国家引导与村委代理”的回族社区设施农业项目过程的考察, 分析在“国家引导发展”过程中发展代理人的实践过程。结果发现: 在国家主导型发展项目所内含的委托代理机制中, 镶嵌于地方性文化网络中的发展代理人通过竞争获取项目代理人的资格; 通过各种具体的权力技术和地方性知识来推进项目实施; 在发展过程中促进了渴望现代性的村民对发展的认同。进而得出结论: “拥有地方性和特定环境的知识”的代理人实际上就发挥着“导航员”的作用, 发展得以实践的关键是代理人。

关键词 发展代理人; 委托代理关系; 国家主导型发展项目; 发展干预

中图分类号: C 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13)05-0099-07

改革开放以来, 发展成为中国一以贯之的头等大事。在以现代化为核心表征的发展话语导引之下, 中国迅速地从短缺社会转入“丰裕社会”, 创造了又一项举世瞩目“经济奇迹”。“中国的奇迹”的创造主要是国家发展战略调整与经济改革的结果^[1], “在现象上发展干预大计以政府之手或貌似以政府之手推动是明显的事实”^[2], 国家对发展的主导地位因而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因此, 在宏观层面上, 发展在功能主义框架下被赋予为“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手段, 演变为共享的价值符号。在微观层面上, 中国学界借用国际发展理论的体系, 将“发展干预”定义成, “为了预定发展目标而进行的改变现状的人为的努力, 是启动和实现发展的主要手段”, 同时将中国的现代化叠入工具层次, 认定“一个国家的发展活动主要是以发展项目的形式来开展的”^[3], 由此建立了发展与发展项目镜像关系, 为直接借用现代性批判话语提供了必要和方便。在将发展实践层面(包括它的失败)放大、泛化之后, 发展研究领域展开了“中国的技术——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模式之间的虚假对话”^[2], 以至于发展被建构成发展的反身性敌人。

可见, 国际发展产业所衍生出来的发展话语与中国情境的现代化模式并未得到区分。在后结构主义的召唤下, 发展的本体被悬置, “发展”最终被解构得一无是处。当然, 不可否认, 在发展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情势下, 发展解构主义确实有助于揭蔽发

展背后的权力关系。但是, 在没有区分中国的发展与国际发展话语之间的差异、中国发展模式还未定型之时, “就追随国际大流, 将现代化模式假想为反贫困干预(发展干预的主要领域)的敌人”^[3], 直接用后发展的话语框限中国。结果, 经由单向度权力观, 发展干预中原本所呈现多样化的关系化简约为“支配/抵抗”模式^[4], 被遮蔽的视野只看到了巨大的“发展的反政治机器”^[5], 必然会扭曲中国发展的情境与所指。

因此, 在主流学界普遍对国家主导的乡村发展项目持警惕甚至反感态度之时, 有必要揭示中国发展的差异之处, 滤去“逼民致富”的刻板效应, 来重新审视中国乡村所进行的发展。基于此, 本文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 以宁夏回族社区设施农业发展项目为个案, 透过发展代理人的视角, 对乡村委托代理关系进行研究, 探究发展项目在地方性情境之中的实践过程以及发展干预在中国语境下仍旧可为的原因。

一、文献回顾

一些关于发展研究历程的回顾性文献^[6-9]清晰地显示了发展研究的转向, 即在发展经济学家或人类学家主导的一套“发展政策与干预”为导向的应用型知识生产机制^①之外, 出现了由建构到解构的发

展研究趋势。发展研究的解构主义成形于 20 世纪 90 年代,矛头直指发展的专业化和制度化,遂形成了一个将发展陌生化、质疑发展本体的“后发展时代”^[10-12]。

解构主义认为“发展并不管用”^[11],且非社会转型之钥,乃是一个包括发展制度、发展机构和发展意识形态的发展产业^[10],是强加于发展对象身上的话语霸权,致使“有待发展”的地区与人民无法思考和寻找符合自己利益的发展道路^[10-12]，“西方”则是这一过程的主体和代理人^{[13]217}。Ferguson 的《反政治机器》便展示了发展机器的失败:发展机构创造了自己的话语形式,这种话语又围绕莱索托构建出新的知识结构,由此形成相应的干预;由于发展机构总以预想分析现状,因而难以达到预期目标^[10]。Escobar 同样认为,发展话语是有效控制“发展主体”的知识生产机器;第三世界人民是游离于发展之外、对发展有选择性的和抵抗的行动者^[12]。另一位发展人类学家斯科特则将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发展项目失败的原因总结为:项目操作者缺乏地方性知识与实践;发展对象使用弱武器对发展项目的抵制^[14-15]。

若然如此,“发展干预何以可为”,便难以理解了。因为正是这些“失败的”干预对乡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乃至主导着乡村社会的变迁。实际上,即便是霸权式的计划,也无法将地方性知识完全排除在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预要改变个体的生活机会和行为方式,就必须直接或间接地进入个体和群体的生活世界之中^[16]。弗格森式的“反政治机器”是由发展干预者与干预者共同开启的^{[13]217-237}。Ferguson 也承认,若不考虑其影响,某种程度上发展干预还是成功的,如“扩大和巩固国家科层体系的权力,突出表现为那种去政治化的经济和社会生活”^[10]。对此,Olivier 指出,后结构主义路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解构主义^[7]。它将发展体系进行干预主体/对象的简单二分,将每一方同质化,把发展曲解为单向的“统治体系”构建行为,结果降低了发展行动者的能动性。与此相应,发展被表述为一种纯粹的“由上至下”,地方性社会运动即为对应的“由下至上”^{[13]217}。这就有了《反政治机器》将发展干预和知识的“委托人/代理人”归为“发展机构”和“规划者”,而当地人、政府或其他群体只需简单跟随时即可。由于发展机构是干预过程的唯一主体,将干预的作用总结为“失败”的人也就很容易地把发展理解成一

个“阴谋”了^{[13]230}。

由此观之,要看懂发展这台戏,需要辨识出话语和政策简单化以及为发展行动者所理解与经验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充分关注:政策施行过程的复杂性,项目机构和专家的社会生活,政策模型背后的利益多样性与行动者本身的视角^{[13]4-5}。在对政策制定与发展运作的反思过程中,Olivier 形成了一种发展代理人的视角,认为通过关注代理人的角色/行动可以更好地解释社会现实^[7]。代理是干预机构无法将其理性施于当地,为了减少干预的不可预见性,增进干预方和当事人关系所做的努力。代理人衍生于发展机构,是发展机构和农民群体的中介,是非正式、个性化且高度不稳定的人^{[13]13}。对于代理人而言,发展构成了一种资源、一项职业、一类市场、一套策略^[2]。代理人在发展项目的实践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有经验的代理人”理解项目委托人的制度语言的含义,在更广泛的层面上,维持社会事实的一致性表达^{[13]16}。

发展的代理人视角本质上是一种方法论而非意识形态的解构主义。它聚焦于不同制度、文化、层级下代理人的角色与行动,着重分析政策话语的本质。它通过考察发展实践的社会过程,以田野个案的形式展示发展的社会过程是如何确保所有的行动者总是能够遵守主流的或官方的话语,并且努力恢复政策目标、隐藏相互分歧的实践逻辑^[13]。所以,在发展项目行动者(包括发展干预者与代理人、项目用户)通过谈判和妥协所建构的中间地带里,代理人成为界面分析的关键。

二、国家主导型发展项目的实践与乡村代理人的行动策略

本文所考察的发展项目源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项目实施地 X 村位于西海固地区,隶属萍乡^②。2009 年 X 村开启了实施农业的建设历程。X 村水泥工架棚共计 240 余栋(免费供给建材,农民投工自建)、日光温室 100 栋(乡政府外包建设、下派技术员监工)。项目建设由政府投资,免费为农民提供辣椒幼苗与技术指导,并由县供销社联系客商进村收购。

1. 代理人的角色获取

在后税费时代,依赖从农村汲取资源的乡村利益共同体破碎、压力型体制松动。一度因此而形成的悬浮型乡村关系^[17-18]在“项目依附型生境”^[19]中,因发展项目而再次连接起来,开启了乡村之间以发

展为名的新关联。然而,看似来自外界免费礼物的发展项目,实际暗含着项目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作为项目委托人的乡政府(也是上一层级的代理人),它控制着项目的最后一公里的投放。虽然项目下乡过程中的村庄竞争增强了乡政委托人的选择,但贸然发放项目,在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的复合作用下,获得项目执行权的村级代理人可能成为区隔乡政府委托的“内部人”。这就产生了代理危机的可能。巨大的事后无效率迫使委托人不得不通过改善事前效率来降低“发展的代理危机”的风险。

作为回应,委托人不是简单、机械地根据模糊的制度性文本进行操作,而是依据个人判断、大量非正式的、默许的惯例^[20],按照委托人的实际偏好来设定代理人的筛选资格。“X村村民经常有上访的,前几任乡领导都不愿把项目放在X村”。但新任乡领导为了推行其“赶超式项目运作方式”,力求设施农业规模连片,就“不计前嫌”地将X村纳入了候选村。当然,乡政府为保证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的目标一致性,必需一个制度化的村级权威,因而在“投其所好”的同时,还需“愿者上钩”。于是,以项目为饵,一场项目下乡所引发的村庄之间的项目之争在萍乡激烈地展开了。

X村之所以能在村庄竞争中胜出,乃是村主任马某积极主动“上钩”的结果。马某通过主管农业的副乡长来打通关节,凭借自身的“高大威猛”,成为了“发展心切”的乡政的理想代理人。

案例 1: X村集体经济的空壳化使得村级公共管理组织无力自主扮演村庄发展的角色,“只能仰仗外部资源的输入”。“上面的资源是通过关系跑出来的”,这是马某对项目竞争的体会。新任乡党委书记到萍乡没2年,马与之个人关系并不深厚。所幸副乡长的表弟是X村会计,也就有了马跑项目的牵线人。在争取项目期间,马前后跑了不下十次。“请客吃饭自然少不了,吃饭时谈事情也比较轻松”。由于萍乡并非民族乡,乡主要干部均为汉族人,即使回民不喝酒,但“在应酬时也会借酒表示热情”。“吃饭时书记还不时向我了解村里的情况”。最终,精心投入社会资本而建立起来的“人情网”发挥了作用,对于马来说,获取项目也就是摄取这一社会网络中的物质资源。

当然,马某为何要争取项目的代理资格,将村组织嵌入围绕发展项目所编织出来的权力网络之中,

不应该成为模糊的事实。就其个人原因而言,主要有两点:一是发展为村干部预留了合法的项目空间。为了稳定货源,搞好蔬菜流通,县供销社把销售代办权赋予村委,代办点从中至少可获得400元/车装运费,这对于年固定工资才4000元的村主任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二是巩固合法性需要。在担任村主任之前,他长年“在外营生,很吃得开”,其个人背景决定了这位高大威猛型乡村精英的合法性不可能完全以传统村治所要求的美德、正义这类规范性合法性为权力基础。马某的合法性更应归类于经验合法性的范畴,这就决定了他必须借助发展绩效来巩固其政治基础。不久前,一件让人背负荆棘的事件加剧了他增强自身合法性的迫切性:乡里把X村水库移民补偿名单有出入这类说不清道不明的事记在了马某的头上,马某被处以党内警告的处罚。为了参加下一届村委选举,他必须用行动在乡里为自己正名。

2. 代理人的权力技术

要顺利推进项目的实施,需要代理人依据其所掌握的地方性知识,在项目设计本身为政策执行所预留的变通空间内^[21],灵活地采取行动策略。作为村庄权威人物的发展代理人,需要通过各种权力技术,避免项目用户不一致的应对发展目标的干扰。

第一,基于村庄的语境来“翻译发展”,形塑村民的认知。马某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并未重述其委托人的发展主义宏愿,而是基于村庄的语境来“翻译发展”,形塑村民的认知:“项目是我要来的”“建棚不要你们投一分钱”“现在收入这么好,看来当初干对了”“水泥工架棚的收入就这么高了,日光温室能差到哪”“提早建好,用一季温室蔬菜补得回来”,而拒绝自上而下发放的免费礼物的村民则会被贴上“不识好歹”的标签。

第二,由易到难顺次推广三代设施农业棚型。在引进竹竿棚之初,马某不仅发动村委干部带头示范,鼓励亲友,以至动员低保户来克服推广突破期的瓶颈^⑤。日光温室的选址再次运用了代理人的地方性知识。X村的日光温室项目先期地址选在了早已枯涸了二十年的河道。虽然早在1980年村民就开始垦殖枯涸的河道,但河道一直被视为公共资源,因此先占河道建温室的阻力较小。

第三,最小化协商成本。一方面,回避与在村中“有地位的”反对者的直接冲突。例如,在日光温室建设动员会上,村中一张姓长老强烈反对占地毁玉

米。但马某并未直接与之争辩,而是由同为 X 村长老、村主任的兄弟当场予以压制。事后,马某亲自上门“开导”,并且通过许诺保障其大棚建材和销售配额的利益来减少强势反对者的阻挠。而对于“普通”村民的反对,高大威猛的乡村精英便显示出手腕的强硬:在推进日光温室二期建设中,个别反对者迅速“被说服”,靠近河道的几位普通村民的耕地快速“被流转”。

第四,利用国家主导型发展项目所授予先赋性的合法性,快速地推进项目。村庄密集地上演了按照项目话语的脚本所撰写的一幕幕发展剧目:为了诱致更多的项目,村委采取了干部带头和广泛动员的方式来尽力完成乡政对 X 村的试点任务;为了快速实现规模连片,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县里所推广的三代棚型的引进(从 2009 年试点竹竿棚到水泥支架棚只间隔一年,再到日光温室只间隔了 3 个月);为了赶在冬季前交付使用日光温室,直接将尚处灌浆期的百来亩玉米铲毁;为了配合县/乡搞好蔬菜流通,村委垄断了蔬菜代办业务(从将县蔬菜站免费供应的辣椒幼苗移栽入棚到第一次交售辣椒只期许了 50 来天)。

第五,不仅在与村民的互动中,马某显示了其高超的权力技术,在争取客商、维护村民利益过程中,亦能看到代理人娴熟的展演。

案例 2:2009 年 7 月 28 日,菜农为县供销社联系的客商熬夜采摘辣椒,清早就装运至村口,直等到下午仍未见货车踪影。供销社打来电话说,客商来不了。马某不与之争辩,立即联系邻村代办。邻村代办说 6 毛 5 一斤,马某说先赶紧过来吧!货车终于开到村头,开始过秤。突然,人群里吵了起来。原来,过秤的人说,价格谈好的 6 毛 5。但马某坚持今天县供销社报价是 7 毛。马某不再回话,径直回到家中。这时,村民叫嚷道,“县里说啥价,就应啥价,我们也不多要一分”,并将货车围住,“今天不收,车就别走”。最后客商打圆场,“应该按县里的办”。值得玩味的是,起事者均是平素与马某来往密切的村民。就在快装运结束时,马某出门与客商寒暄了一阵。

上述市场博弈之中,马某通过模糊标价,灵活地将客商联系到村庄;出现分歧时不与客商直接争执,既维护村民利益,又力图保持与客商的关系,可谓长袖善舞。值得一提的是,其策略得到了村民的呼应。

这似乎说明了马某的权力技术是一种地方性默会智慧。

3. 代理人与发展的认同

解构主义对发展话语的理解为,能动的代理人与被动的项目用户之间的单向权力建构过程。若然于此,为何 X 村人对代理人推进发展时表现出了“总体上积极配合”,而不是对发展进行普遍的日常生活抗争呢?笔者认为,代理人权力的合法性,是村民对发展项目认同的试剂。而要理解代理人的权力实现过程及其性质,需要我们以具体的乡土性村治为背景,同时从权力的主体和客体 2 个方面来考虑。

权力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及合法性是分析的重点^[22]。X 村是一个回族村落,宗族组织呈现大族与多个小族并存的结构,长老与家族、规范与舆论、宗教组织以及村民之间非正式合作等关系相互交织,形成了 X 村很强的内生性秩序生产能力^④。笼罩在这种文化网络之下的村干部往往比较看重村庄内生价值,即贺雪峰所归纳的“声望、面子,广泛的社交网络及其带来自我实现感甚至政治抱负的达成等社会性收益”^[23]。现任村主任马某是一位高大威猛型乡村精英,之前“在外营生,很吃得开”,然而一旦占据了村庄权力的中心位置,马某所扮演的角色,就具有偏向村庄而成为保护型经纪内在倾向。同时,乡村代理人的权力并非没有上限,反对日光温室建设的张姓长老的利益仍能得到保障,便说明了 X 村门户竞争所造成的 X 村权力制衡的格局。

案例 3:针对日光温室占地一事,多数 X 村人认为,建棚是想把大伙扶起来。他们认为,反对占地建温室的人算错了帐,辣子强过玉米,即便自己种不了棚也可按一年每 667 平方米 600 元的标准转让。结果,个别反对者在发展大势的裹挟下成了屈从者,他们无奈地自嘲到,“村上的那些人咱不去惹。农民,老黄牛他哥,受气的。占着地,推玉米,不赔偿,就当是西沟的水吹了”。7 月 21 日在交售现场,负责分发蔬菜交售配额的村组长被认为发放“不公”,遭其一位马姓的叔辈当众掴了一耳光。

因此,代理人权力的实施所依据的是权威而非威权。前者强调影响权力客体的正当性,后者则是单项度地对权力客体的强迫。于是,身嵌 X 村文化网络之中的代理人在施展权力时就会获得最低程度的认同,代理人权力的权威性质与其所代理的业务

先赋性合法性互为表里。

当然,杜赞奇所谓“权力是各种无形社会关系的合成,权力的各种因素存在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甚至亲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之中”^[22],为静态地理解 X 村的权力格局提供了理论路径。但考虑到“发展”给 X 村社会秩序带来的一系列动态效应,就需要从权力的生产性与流动性中来理解代理人对其服从者的构建过程^⑤。实际上,发展项目的代理/干预主义底蕴为其代理人提供了搭乘发展从外部植入权力的便车的机会。这样,还需要分析代理项目的运作所引致的代理人权威的再生产效应,即权力的建构性。

在生产层面上,X 村设施农业所带来的立竿见影的发展效能强化了村民对发展与干预代理人的认同。萍乡 20 个行政村,日光温室 800 个指标,X 村就争取到了 1/4 的名额,项目因而被说成是马某“要来的”(村民也认为如此)。由于蔬菜的商品性极强,不及时出售就会烂在地里,这造成了村民对垄断代办点的依附性。马某负责代办 X 村蔬菜的收购,向菜农分发交售配额,代表村庄与客商谈判,为村民带来了看得见的利益,这也是增强村民对其权威认同性的绩效基础。笔者根据代办点发票存根统计,6 月 15 日至 8 月 17 日,X 村总计交售青椒 23 万 kg,总收入达 36.6 万元,户均增收 2 559 元,单个大棚收入达 3 000 元。面对“现金前所未有的成了维持生计之钥匙”^[24]²⁴⁰的铁律,相对于劳动力主体的虚拟商品化的更大风险^⑥,设施农业为小农提供了应对商品化的替代方案。于是,在 X 村人普遍认为“在外打工要受苦,却只能糊口”的情况下,预期具有长远保障的设施农业甚至吸引了不少村民返乡。据村妇女主任介绍,现在 X 村有 11 名返乡的农民工,其中有 7 人仍会到县城打零工,余下的人已安心在家从事大棚种植。一些上了年纪的打工者更是认为设施农业是返乡后的生计依靠。返乡,这一生计抉择,折射出村民对村庄发展的信心。

代表着国家意志、且以礼物形式发放的国家主导型发展项目,因资源的不平等所形成的农民对国家的依附关系,具体化为代理人项目用户之间的互动。透过“权力+项目之网”的网眼,村民能够直接地感受到代理人权威的扩张。如,村委代办点排斥私人收购,显示出权力的时刻在场;利用蔬菜配额的发放权强化菜农对权威的依附。因此,在符号层面上,国家主导型发展项目是以国家为名,通过输入

现代性向村民做出的美好许诺。这与渴望现代化的农民相互通约^[25],而非斯科特所先定的国家/农民的二元对立。此种通约性使“发展”成为国家与农民共享的价值,经由乡村代理人的再生产,其总的效应是促进了农民对自上而下推动的发展大计的认同^⑦。

案例 4: X 村支书曾将水库移民安置名单虚报一事告到乡里的,此事连带到马某。之后二人虽是本家亦井水不犯河水。由于项目是马某接洽、实施的,自然不会让支书过手,虽然支书的妻子也种了一个棚。随着设施农业逐渐成为村庄生活中心,支书在村庄政治舞台中被边缘化了。乡干部给村里布置一些真抓实干的任务时,偶尔也会遗忘这位书记。就连原本直属于村党组系统的妇联、民兵组织也被吸纳到项目建设与蔬菜代办的工作之中。结果,发展机器的权力逻辑造成了“强主任、弱支书”的村治格局。在中国乡村治理的“书记一把手、主任二把手”正式制度安排下,X 村体制内权力的逆转可谓是发展带来的“意外”。

三、结 语

虽然项目下乡对乡村的影响一言难尽,但它至少将村庄导入了动态的发展轨道。X 村人深刻地感受到了发展的效能,不仅在于收入提高,甚至还因“发展的逻辑”拉动了村庄公共品的供给^⑧。因此,透过发展代理人的视角,国家主导型发展项目所呈现的并不必然就是为解构主义所批判的干预者单向推进、对发展对象的知识与需求的排斥过程。自上而下的发展项目包含了不同层级的代理人,发展代理人正是本文在探讨发展何以实践的主体性概念。

在由各种非正式化、谈判与妥协过程所构建出的中间地带里^[16],镶嵌于地方性的文化网络之中、掌握地方性知识并分享国家主导型发展项目内在合法性的发展代理人是发展项目得以实践的关键。这包括 2 个方面:一是委托人通过项目发放过程中代理人资格的筛选,为项目下乡选择适宜的村庄代理人;二是作为村庄权威人物的发展代理人通过具体的权力技术来降低项目实施的交易成本,并促进村民对发展的认同。实践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型发展项目需要一种“导航艺术”“拥有地方性和特定环境的知识”的代理人实际上就发挥着“导航员”的作

用^[14]：它将不能被正式设计在规划中的许多非正式活动、临场发挥包容到项目的实施过程，例如项目营销、项目进度把握、项目选址等；甚至将项目内外相互交织的权力关系整合到项目运作之中；通过代理人具体的权力技术，将国家主导型发展的宏大远景转换成村民所认同的话语，以此将发展从抽象的规划文本顺利地转换为地方性的发展实践。

就代理人本身的属性而言，在操作项目过程，“发展”也为他们创生出资源、策略以及巨大的项目空间。不断积聚的自主性使发展代理人成为高度不稳定的人，引发了代理人偏向于保护型经纪人与掠夺型经纪人的不确定性。那么，如何将权威的功能限定在保护性之上而抑制其掠夺性呢？按奥尔森的观点，稳定的共容利益是权威具备持续发展意愿的基础^[26]。不过，理性选择模型并不容易解释乡村复杂的文化景观。发展政策并不是通过明显的压制而是通过对发展支持者赋权的权力生产形式来建构秩序和对日常生活产生影响的^[13]。由于基层代理人本身就受到乡村文化网络的规训，处于具有自主价值生产能力、较高社会关联的村庄之中的村干部往往成为保护型经纪人^[23,27]。因而在具体的乡土性村治情境中，代理人所表现出的自主性是一种“嵌入式自主性”。X村项目之所以能顺利实施并确保了村民受益，就得益于此。

总之，若仅以项目的文本制度为分析重点，国家主导型发展项目不免会落入了饱受批判的“由上至下”的单向“统治体系”构建的窠臼。相反，发展代理人的视角以一种方法论的而非意识形态的解构主义来分析发展代理人所推进的国家主导型发展项目过程。结果，在解构主义所累积的“后话语”语境中，项目逻辑上的“非连续性断裂”，经由发展代理人视角的再审视得以重获连续性。

参 考 文 献

- [1] 林毅夫. 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2] 叶敬忠. 走出发展干预的误区[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1): 4-6.
- [3] 朱晓阳, 谭颖. 对中国发展和发展干预研究的反思[J]. 社会学研究, 2010(4): 175-198.
- [4] [美]卢克斯. 权力[M]. 彭斌,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 [5] 潘天舒. 发展人类学概论[M].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9.
- [6] GARDNER L. Anthropology, development and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M]. London: Pluto Press, 1996.
- [7] OLIVIER S. Anthropology and development [M]. London & New York: Zed Books, 2004.
- [8] 杨小柳. 发展研究: 人类学的历程[J]. 社会学研究, 2007(5): 188-206.
- [9] 刘晓茜, 李小云. 发展的人类学研究概述[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09(5): 38-47.
- [10] FERGUSON.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 development, de-polar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1] SACHS. 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 [M]. London: Zed Books, 1992.
- [12] ESCOBAR.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3] LEWIS, MOSSE. Development brokers and translators [M]. Illinois: Kumarian Press, 2006.
- [14] [美]斯科特. 国家的视角[M]. 王晓毅,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15] [美]斯科特. 弱者的武器[M]. 郑广怀,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 [16] LONG. Development sociology: actor perspectives [M]. London: Routledge, 2001.
- [17] 周飞舟. 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J]. 社会学研究, 2006(3): 1-38.
- [18] 贺雪峰, 刘金志. 土地何以成了农民的权利问题[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10(1): 19-28.
- [19] 朱敏. 民生与乡镇治理[J]. 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0(1): 158-163.
- [20] 叶敬忠, 那鲲鹏. 发展干预社会学研究综述[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08(3): 46-54.
- [21] 周雪光. 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J]. 社会学研究, 2008(6): 1-21.
- [22] [美]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 [M]. 王福明,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 [23] 贺雪峰. 中国乡村治理[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5(3): 42.
- [24] 阿帕杜雷. 印度西部农村技术与价值的再生产[C]//许宝强. 发展的幻象.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 [25] 安普雨. 对现代化的渴望[D]. 北京: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2011.
- [26] 奥尔森. 通往经济成功的一条暗道//比较, 第十一辑[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4.
- [27] 贺雪峰. 论村庄社会关联[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3): 124-134.

注 释:

- ① 亨利·伯恩斯坦指出, 战后勃兴的发展研究的支持者和批评者的共识是: 发展研究作为政策科学, 其基本主题就是找到协助国家主导发展的方法。发展研究的合理性在于其满足了实践发展主义对知识与合法性的需求。作为政策科

学,发展研究集中于两大主题:经济增长和怎样促进经济增长;贫困和怎样消除贫困。

- ② 早在2007年,自治区就规划到2011年发展设施农业6.6万 hm^2 以上。后金融危机时期返乡农民工增收难作为一种倒逼机制又赋予了设施农业新目标,自治区要求提速发展设施农业。不久,区、市、县都把2010年看成全面完成“十一五”目标、谋划“十二五”规划的关键年、实施西部大开发第二个十年规划的开局年,认为国家今年将出台西部大开发的新规划,要求吃透新一轮大开发的政策要义和项目布局,争取快上项目、多上项目、上好项目。这一激励迅速向下传导,市里提出建设“宁南黄土丘陵生态农业示范区”的规划,县里则提出抢抓全国辣椒产业北移机遇,稳步扩大栽培面积,建成西北重要大棚辣椒产区的战略。这便是萍乡与X村设施农业的项目背景。以上援引自治区、市、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县农牧和科学技术局辣椒产业发展情况汇报。显然,这些文本都可以被解构主义者纳入发展主义范畴。
- ③ 低保户之所以成为早期技术采用者,其实是一种半威胁状态下的权衡结果;若不配合项目实施,其低保资格可能被取消。
- ④ X村土地大部分原为张家地主所有。张家在20世纪40年代逐渐衰落,不久迁出。之前作为张家地主雇农的吴姓村民在1950年政治上翻了身,进而主导着这一时期的村庄权力。民国末年为逃兵役而投奔X村的马姓村民,因擅做买卖在文革时期被批为“资本主义尾巴”,沦为村庄无权阶层。马姓普遍认为,此间优越的政治地位导致吴姓的不思进取。改革开放后,善于经营、肯下苦力的马姓终于问鼎村庄权力。不过,在历经政治革命、现代性输入之后,X村村民对宗族的认同内缩至门户。在村民自治制度嵌入村庄以后,村庄政治舞台上演了一幕幕以选举为名的家族利益竞争剧目。各门都希望选出自家族中之人,期冀方便地与公权力相勾连。门户竞争保持了村庄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大体的权力制衡。
- ⑤ 此处借用了福柯的权力理论。福柯将权力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实际关系网络之中,认为权力来自下层,是从底部开始建构的,是一种协商的结果,需要从权力的具体运作策略出发进行分析。
- ⑥ 对于卡尔·波兰尼而言,商品是那些为了在市场上出卖而生产之物;土地、劳动力和货币都是虚拟商品,因其最初生产出来并非用于出售。新古典主义把劳动力当成商品,用边际工资等于边际产出来将工人“推来搡去”,将劳动与生活分离,意味着毁灭生成的一切有机形式。
- ⑦ 明亮将这种基于社会大众自下而上认同的由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以经济增长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现代化进程称为认同型发展。
- ⑧ 在辣椒销售旺季,村路被40年不遇的暴雨冲毁,但10年来苦于无路可行X村人却得以在县/乡拨款下一举重建村路,虽然修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搞好蔬菜流通。

Development and the Rural Development Brokers During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

——A Case Study of Community Facilitie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roject in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ZHENG Peng, LI Chan-juan, ZUO T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Abstract This paper is exploring the practic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brokers who agented the 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 Through observing the process of the Hui nationality community facilities which was directed by government and agented by the village committees on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brokers, it was found that, among the principal-agent mechanism included in the 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 project, the development brokers who embodied in the local cultural net, acquired the project through the informal process; implemented the plan by specific technology of power;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identity of villager who are eager for modernization by local authority which also reproduc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erefore, "owning local and specific environment knowledge", the agent actually plays a "navigator" role, the agent is the key to development practice.

Key words development broker;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 project

(责任编辑:金会平)